

制約與被制約

◎ 單世聯

哈佛燕京學社、三聯書店主編：《儒家與自由主義》（北京：三聯書店，2001）。

三聯書店最近出版的《儒家與自由主義》一書，載有杜維明與陳名兩位先生的對話。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觀察，這就是西方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對當代中國學人魅力無比的韋伯（Max Weber）、福柯（Michel Foucault）、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羅爾斯（John Rawls）諸人，都有一個資源不足的問題。比如韋伯不能理解儒家在「這個世界」又要超越「這個世界」並要轉化「這個世界」的價值取向；哈貝馬斯和羅爾斯無法充分回應正在干擾人類的生態問題；福柯對希臘詩歌與神話的不求甚解等等。聲名顯赫的「大師」都有嚴重欠缺，中國學人似乎有理由為自己在學術思想上的種種不足而心安理得。

但有一基本的不同，韋伯等人至少對於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些核心方面有比較精深的認知和洞察，對其時代的思想要求和社會壓力也有比較自覺而充分的回應，並因此提出了內在西方歷史與現實的重要問題，參與引導了一個時期的學術思想。而中國學術群體顯然還沒有進入這個境界，嚴格地說，我們不但不大可能提出內在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真問題」，即使在基本的學術訓練與知識準備方面也差得遠遠不夠，制約目前學術思想的種種因素其實是被研究者自身的條件所制約的。

這樣說是因為我在讀《儒家與自由主義時》時，同時看到賀照田評論當代學術思想的一篇文章。學術思想上的混亂與無奈，不但是學問中人，就是局外人也早已有所感覺以至氣懣，各種的意見和文章很是不少。賀文對此作了一次認真而集中的反省，具體評說儘可商討，論題排比或有不當，其尖銳直接的論析得到眾多認同當是無疑。讀完此文後的自然反應是：怎麼辦？

不可能有權威的或者大家都認可的答案，每個學者都會有自己的「意見」。從杜維明和陳名的對話所受到的啟發是，學術研究上的種種困境其來有自，我們對制約學術思想的種種因素的反省還可以更進一步，制約實在是被制約。問題甚多，且說三個較為淺近的事實。

沒有一個天生的學者。如今正是好年華的學者原來不過是學業好的普通學生，在小、中學階段，我們與後來組成「大眾」的所有人一樣忙於對付高考。進入大學之後，一小部分人或許是遇到了好老師，或許是個人讀書有所體會，總之，我們在大學畢業時已經對某種學問有了興趣和熱情。此後是兩個階段的研究生，跟著老師接受了一些學術訓練；畢業後理所當然地進了大學或科研機構工作。從此，我們的生活就是讀書寫書，熬了幾年後我們成了教授或研究員，擁有了社會公認的學者身份。如此描述只是一個大略，因為我沒有把一些因偶然原因或混跡於學界的人考慮進去，也沒有把為了成為學者而認真進行自我訓練的學者考慮進去。在此一般性的過程中，實際上使我們成為學者的只有兩個條件：一是有較好的學業成績，二

是職業或身份。成為學者之後，只要稍微勤奮，一般都不難發表論文或出版著作；外語較好且專業與國外聯繫較多的，還可以不斷出訪為國外所知。

由此成長起來的學者是不可能避免各種「制約」的。首先我們的知識積累就很不夠，更談不上杜維明所說的「長期的批判性的積累」。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不懂外國文化已是「正常」的專業分工使然，即使研究外國文化，比如研究德國文化的，恐怕不會比韋伯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更多。至於長期研究中國學術的，他（她）真正了解的也許只是先秦一「子」或宋代的某一詞人。其次，學者們從事學術工作，主要是文本閱讀和解釋，能夠讀懂讀通幾本古（洋）書、釋清古（洋）意已是不易，不但不能提出甚麼「內在於我們歷史與現實的真問題」，甚至也沒有可能深入歷史與現實，比如今日的學者就不可能像梁漱溟那樣得到權力支持從事一個地區的「鄉村建設」，研究中國哲學的也不像馮友蘭那樣在顛沛流離之中懷抱「以志艱危且鳴盛世」的追求。如何使學術思想具有真正的歷史意識和現實關懷的問題，基本上沒有被學者充分意識到，它們通常被排斥在我們的學術訓練和關懷領域之外。於是，賀文所說的諸如脫語境地弘揚傳統、抽象化地使用外來學理就難以避免；擱置「意義」意義問題、輕率地獲得自我意識、無視後發現代化國家的處境等等，就勢在必然。正視知識界的現狀，如果沒有這些「制約」倒是奇怪了。

與「大眾」沒甚麼兩樣。絕大多數學者都是平民出身，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像狄爾泰（Wilhelm Dilthey）那樣終生不進廚房、不擦皮鞋。在傅斯年當年著意催生的「學術社會」還沒有真正建立之前，我們基本上沒有在世俗日常之處建立一個學術空間。如果說恪守學術的嚴肅性、為學術創新而工作，本是學者之為學者的底線，那麼在目前，學術之於我們首先是職業，是我們得以在這個世界生存下來的衣食之源；其次，它是我們的興趣，開始是喜歡從事這一工作，後來是生活的慣性使我們安然於此，我們只是把學術看作是一種「行當」而不是韋伯所說的「志業」。這當然是正常的，沒有理由要求學者必具「天降大任」的自期。但面臨歷史和現實中的種種問題，缺少心理緊張和熱情投入畢竟使我們的思想難具洞察力，甚至根本進不去。當然無論是分工還是興趣，長期的「學者生活」反過來也塑造了我們，我們參加學術討論；我們談論一些「大眾」不太關心或不關心的論題，或者把「大眾話題」引伸為一種觀點、一種理性化的表達；我們甚至養成了夜間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但所有這些「學者行為」並不全然是「精英」的，為了學位、職稱、項目、評獎等等，我們的獲取方式完全是世俗化的，通過層層考試選拔上來的學者們，理所當然地以其聰明才智在學術名利場上縱情煥發，「學術交易」與日常交易沒甚麼兩樣，「學術腐敗」在性質上與其他腐敗沒有不同，教授抄襲之事南北均不罕見。不思考、不探究諸如賀照田所說的「九個問題」，也絲毫不妨礙我們成為合格的「學者」。生活與學問應當有所區分，但要指望把學術淹沒在「生活」之中的學者有甚麼真正的問題意識和智性創造，肯定是要失望的。

這就是說，學者只是在身份和職業上與「大眾」不同，而在個人欲望、行為方式上卻基本一樣，在媚俗、媚勢、媚權上甚至更勝一籌。因為有「不同」的方面，學者們就沒有必要理會「民眾」的關懷，甚至正是借助置民眾的關心於不顧來維持「學者」身份；為了強化這一「不同」，學者們在注視底層痛苦時，很可能是為了充當「代言人」的角色為自己贏得一份論說優勢，底層艱苦更多是建構學者自我的「他者」，他們的價值觀念、生活邏輯、主體感覺、精神欲求極少引起我們的深切關注。知行分離在今日已不再令人驚奇，不要說是匡扶正義，就是學術尊嚴已很難維護。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的評估，高級專業人員屬於當代社會的「上層」。既然已是「上層」，還有甚麼必要走進剛剛擺脫的下層？且不說對他人和自己精神痛苦、身心感覺的真正切入，即使對自己的痛苦也無需老實

面對。在一些感覺良好、虛驕傲慢的學者中，既找不到朱光潛式的親切謙和，也難以發現熊十力式的學術自信。以至於經常有人議論說，讀某一學者的書比認識其本人好。

做學問的表現形式就是讀書、思考、寫作，論文、著作之類是學者業績的主要標誌，而在目前，學者的地位主要就取決於論著的多少和發表刊物的級別。且不論這是不是就是學者的全部，即使如此，我們寫作的直接動機往往並不是抽象的「繁榮學術」，更少是回答歷史與現實的提問。我前天寫一篇文章是因為約稿的那家報紙稿費較高；而今天寫這篇文章是因為編雜誌的朋友催得緊；明天要寫的文章是為了捧一個學術會議的場；正在寫作的一本書是準備明年提職稱用的；而下一本書則屬於已經領了經費的某個項目。當然我確實計劃做一些「為己之學」，比如寫篇自己真正想寫的文章，但因為這個「己」早已被上述種種類型的寫作刻畫成「寫手」了，也就談不上有甚麼真切的體驗和值得重視的關懷。讀書和寫作經常不是使我們脫離此時此地的情境進入一個學與思的境界，如果不是為了世俗應酬，更多的也只是為寫而寫的習慣性行為。至於我們能夠做甚麼、我們在某一知識領域向前推進了多少、我們的觀點是否把握了社會文化的某一關節之類的問題，很少進入我們的寫作狀態，發表或出版成為寫作的目標。當學術垃圾成批生產出來之時，學術名人也就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

所以，評論學術思想的研究現狀，有必要提出一個陳舊的問題：我們為甚麼做學問？不回答就不應當再做學者。肯定有人仔細考慮過，也肯定有許多人根本沒把它當作一個問題，而重要的是，即使思考過的人恐怕也極少因之就不當學者了。學術研究既無古人「安身立命」的意義，亦無哈貝馬斯等人認真為社會開藥方的用心，而是一種相對輕鬆自由且較易發揮個性的行為。如果再聯想到假如真的對現實和歷史認真起來，沒準兒還會引來麻煩，誰願多此一事？學術就是學術，它的獨立成為迴避嚴峻問題的護身符。不滿學界現狀的人會很多，只是同意了也就是同意了，接下來的是「制約」依然。過多地數落學者是沒有道理的，「精英」與「大眾」一樣都是環境的產物。但學者仍然有自己的責任，因為他們有改造環境的義務，而學術也內在地具有矯正環境的責任。如果寫作只是順從的、被動的，那麼它肯定與其環境一樣不斷地爛下去而毫無意義。

1922年，朱光潛先生寫過一篇〈怎樣能改造學術界〉的文章，結論是「改造精神」、「改造環境」、「培養改造環境的領袖人才」。他最後倡導「三此主義」：「從何處改造起？此地。從何時改造起？此時。從何人改造起？此身。」我想，目前的學術思想界也需要提倡「三此主義」。

「三聯·哈佛燕京學術系列」是目前大量出版物中不多的精品之一，從已出的兩輯看，它比較注意把國際學術思想領域的一些前沿思考及時地傳播到漢語學術界，這是非常重要的，但也只是第一步，接下來的，是我們如何把它真正消化為自己的資源，使這份精心編輯的系列不再像眾多譯著一樣只是在中國學界「風行水上」，一片漣漪過後迅即無影無蹤。它應當是一顆石頭，能夠攪動表面熱鬧實則無風少浪的中國學術界。